

写作掌故杂谈(二)

潘述羊

标题与审题

写文章除了“按语”、“序跋”之外，一般总要有个“标题”。虽然我国古代作家，如唐之李商隐，集中就多有《无题》诗。不过名曰“无题”，其实心中还是“有题”的，只是不愿明言罢了。在人类社会，无论中外古今，忌讳与顾虑，往往难免。因此，有的人或以诗文的起首二字名篇，故意造成一种标题无法概括全诗内容的情况；或则径以“失题”称之。这些都是标题的变体。

一般说来，标题是文章的旗帜，它服务于揭示主题，体现文章的中心内容。好的标题，能引导读者理解文章内容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有的标题还能使读者在读完全篇之后，获得一个总括的概念与完整的印象，从而巩固收获。

文章的体裁不同，标题在体现主题上也就有所差异。论说文的标题大都直接与文章的中心论点有关；而记叙文、文艺作品的标题，则不一定直接揭示主题。但好的标题必须是确切、简洁、生动的。

自己写文章要考虑标题；命题做文章，就应当审题。所谓审题，指的是仔细分析和反复考究题面文字，以求领会题意，掌握要求，扣紧题面，确定中心思想，安排层次段落，考虑开头结尾，然后舒花布实，完成一篇作文。

在审题过程中，大体上说需要弄清以下三个问题：第一，题目所规定的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取材范围；第二，题目所要求的文章的内容重点和中心思想；第三，题目暗示的体裁。

五代王定保撰写的《唐摭言》，前面好几处都引证过，是一本详载唐代贡举考试制度，以及与此有关的遗文佚事的笔记。对于研究唐代文化史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。其中卷五有一则谈写文章如何审题，如何标题的掌故：

羊绍素夏深有《画狗马难为功赋》，其实取“画狗马难于画鬼神”之意也。投表兄吴子华，子华览之，谓绍素曰：“吾于此赋未佳。赋题无鬼神，而赋中言鬼神。子盖为《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》即善矣！”绍素未及改易。子

华一夕成于腹笥。

有进士韦象，池州九山人，始以赋卷谒子华，子华闻之甚喜。象居数日，贡一篇于子华，其破题曰：“有丹青二人，一则矜能于狗马，一则夸妙于鬼神。”子华大奇之，遂焚所著；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。

其年，子华为象取府元。

这个故事说明了好几个问题：首先，羊绍素送给表兄吴子华看的那篇文章，标题与内容不相应，子华建议改为《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》是完全正确的；其次，绍素的原题《画狗马难为功》，这说法不合逻辑。因为没有同“画鬼神”相比较，怎么能单独判断其“难为功”呢？可见议论性的文章，标题的简洁仍应坚持以辞害意的原则。再次，韦象的文章的开头（破题），完全扣准了《画狗马难于画鬼神》这题目，可以作为审题得当，开门见山的典范。难怪“其年，子华为象取府元”！
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

晚唐著名诗人杜牧，字牧之。后人以其晚于杜甫将近百年，遂称之为“小杜”。他擅长绝句，尤其擅长写景抒情的绝句，笔触清丽生动。有一首题为《江南春》的小诗，短短二十八字，简直就是一幅彩色斑斓的江南水乡春景图——江南春光，明媚多姿；江南景色，烟雨迷濛：

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

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

杜牧主张严禁佛教，将寺庙土地收回归公。这首诗的后两句，不仅仅写景，还表现了诗人对统治阶级佞佛的嘲讽，思想性是高超的。

但，对于这首千百年来赞为好诗的《江南春》，明代状元杨升庵却提出了责难。他说：

唐诗绝句，今本多误字，试举一二。如杜牧之《江南春》云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，今本误作“千里”。若依俗本，千里莺啼，谁人听得？千里绿映红，谁人见得？若作“十里”，则莺啼绿红之景，村郭、楼台、僧寺、酒旗皆在其中矣（《升庵诗话》）！

杨慎要改杜牧的诗，但不明说自己要改，却借口俗本有错字。这大约是明朝人的风气（参看周振甫《诗词例话》）。不过杨慎的意见并不正确。清代就有人表示反对：

升庵谓“干”应作“十”，盖千里已听不着、看不见矣，何所云“莺啼绿映红”耶？余谓：即作十里，亦未必尽听得着、看得见。题云《江南春》，江南方广千里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红焉，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，四百八十寺，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，意既广，不得专指一处，故总而命曰《江南春》。诗家善立题者也（何文焕《历代诗话考索》）。

事物越考究越清楚，道理越辩论越明确。现在，我们认识到：“干”字不仅没有错，而且用得对，用得恰当。只有审准了题目要求的范围，才能扣紧题旨作文章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还领会到，这首诗题目标得好，若作《九州春》，则题目的范围超过了四句诗所描绘的范围；若作《金陵春》，则题目的范围又小于四句诗所表现的范围了。

但，以上的分析只是就题论题，杜牧诗的精彩处还远不止此。前人谈到审题、标题时，曾指出：

凡作文与诗，有一题本分所当有者，有作家自己才学识襟抱之所有者。既自家有才学识，又必深得于古人，真传一脉，方为作者。若于词足尽题，莫有异观（方东树《昭昧詹言》）。

可见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就其扣准题面，深化题意来说，何啻一字千钧！

谈到杜牧反对佛教，使人想起他早年的一个故事来。他是中唐著名宰相杜佑的孙子，进士及第，制策登科，在长安名气极大，可是却遭到和尚的冷遇：

杜舍人牧，弱冠成名。当年制策登科，名振京邑。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，至文公寺。有禅僧拥褐独坐，与之语，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。问杜姓字，具以对之。又云：修何业？旁人以果捷夸之。顾而笑曰：皆不知也。杜叹讶，因题诗曰：“家在城南杜曲旁，两枝仙桂一时芳。禅师都未知名姓，始觉空门意味长。”（唐彦瓘《本事诗》）

杜牧后来写过《杭州新造南亭子记》，文中猛烈地抨击了佛教地狱轮回的骗人鬼话，揭发了统治阶级在犯罪作恶而又害怕受到惩罚的恐惧中，企图借助于信佛“卖罪买福”的卑鄙心理，是一篇在唐代很有影响的反对佛教的文章。

郑板桥论标题

郑板桥，名燮，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、文学家。乾隆元年中了进士之后，在山东范县和潍县当知县前后十二年，又是一位有名的清官。他“爱民如子”，处理诉讼“案无留牍，亦无冤民”。在潍县时“岁荒，人相食，燮开仓赈贷。或阻之，燮曰：‘此何时！俟辗转申报，民无孑遗矣。

有谴，我任之！’发谷若干石，令民具领券借给，活万余人。”到了秋天又歉收，郑燮“捐廉代输，去之日，悉取券焚之。”在封建统治阶级里，实在是非常难得的。

郑燮的心灵美，境界高。他三岁丧母，由乳母抚养成人。后来他始终敬重乳母和继母。郑燮还十分爱护和关心堂弟、子侄以及所有的族人；他周济贫穷，帮助寒士，有口皆碑。他当了十多年的官，由于“请赈，忤大吏，乞疾归”（参看《清史稿》及《兴化县志》本传），囊橐萧然，后来靠卖书画为生。这些当然都值得称颂。但此处要讲的，则是他谈诗文标题的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意见。

他的弟弟大约颇喜欢写诗，郑燮曾写信对弟弟说：

作诗非难，命题为难。题高则诗高，题矮则诗矮，不可不慎也。（《郑板桥家书·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》）郑燮在这里讲的自然是诗的题目，即标题。但细绎其意，似乎还包括主题思想在内。那就是说：好的标题应当反映出主题思想来。接着，他还分析道：

少陵诗高绝千古，自不必言，即其命题，已早据百尺楼上矣。通体不能悉举，且就一二言之：《哀江头》、《哀王孙》、《伤兵》、《新婚别》、《无家别》、《垂老别》，前后《出塞》诸篇，悲戎役也；《兵车行》、《丽人行》，乱之始也；《达行在所三首》，庆中兴也；《北征》、《洗兵马》，喜复国望太平也。只一开卷，阅其题次，一种忧国忧民、忽悲忽喜之情，以及宗庙丘墟、关山劳苦之苦，宛然在目。其题如此，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！

他进一步以杜甫作品的标题同陆游作品的标题作了对比分析，然后指出：

近世诗家题目，非赏花即宴集，非喜晤即赠行；满纸人名，某轩、某园、某亭、某斋、某楼、某岩、某村墅，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，今日才立别号，明日便上诗笺。其题如此，其诗可知。其诗如此，其人品又可知。

最后，他告诫其弟说：

吾弟欲从事于此，可以终岁不作，不可以一字苟吟。慎题目，所以端人心，厉风教也。

这里的“端人心、厉风教”就是政治标准第一的问题。封建社会的标准和社会主义的标准，不言而喻是大相径庭的。今天我们要求的，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。

板桥虽然谈论的是诗歌问题，其实写一般的散文也不例外。就以长篇小说来看，标题的高矮也要反映作品的思想性的。当然，有时这类小说常常是写好之后再加标题的。例如，在我国非常流行的《牛虻》是十九世纪艾·丽·伏尼契的名著。作品塑造了一个英勇无畏、刚强坚毅、彻底献身于革命事业的英雄人物。作者为何要以《牛虻》作为标题呢？这是因为她从小赞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悲壮的一生。苏格拉底被法院判处死刑时对审判官说：假如诸位提出条件，说只要我以后不再从事哲学研究，就可以释放我，让我活着的话，那我要回答说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坚决不放弃哲学研究。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

的。我被神派遣到这个城市里来，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，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。作品的主人翁正是这样的人物（参看张守仁《〈牛虻〉是怎样写成的？》）。

“题高则诗高，题矮则诗矮。”板桥这两句话是颇有道理的。

“登山采珠”

《唐摭言》还有一则故事，也是与审题有关的，兹转录如次：

令狐文公镇三峰，时及秋赋，特置五场试：第一场，杂文；第二场，试歌篇；第三场，表檄。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，来者皆慄缩而退。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，文公与从事皆鄙之。专令人伺其词句。既而试《登山采珠赋》，曰：“文豹且异于骊龙，采斯疏矣；白石又殊于老蚌，剖莫得之。”众皆大惊，遂夺弘正解元矣。

这里先要解释一下“骊龙”一词。成语里有“探骊得珠”的说法，源出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河上有家贫而恃蓍萧而食者，其子没于渊，得千金之珠。其父谓其子曰：‘取石来锻之。夫千金之珠，必在九重之渊，而骊龙颌下。子能得珠者，必遭其睡也。使骊龙而寤，子尚奚微之有哉！’”后代也有人把文字之中肯者，称作“探骊得珠”。

令狐文公出的考试题目曰：《登山采珠赋》，这同我们讲的“缘木求鱼”意思完全一样。采珠只能入海，登山除了狩猎与取石之外是绝对不可能得珠的。马植乃一武将的儿子，他敢于参加大家“皆慄缩而退”的秋赋五场试，起初不被人重视，乃至“鄙之”，这也是常情。但马植善于审题，而且全面地考虑了题目的要求，象一名技艺高明的锻工，屹立在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”的铁砧旁边，挥动巨臂，迅速地锤炼出一语破的而又义蕴深沉的名句。真所谓“立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。”（陆机《文赋》）正是这个警策使早先瞧不起他的人，其中也包括镇守三峰的令狐文公，为之惊叹赞赏。马植终于战胜了卢弘正，考取了第一名解元。

白居易的一份试卷

白居易，字乐天，下邳（今陕西渭南）人，出生于河南新郑。晚年寓居洛阳香山，号香山居士。他是唐代文学家中间早慧而又有大成的一个。据说他才六、七个月时，乳母抱在书屏之下，指着“之”字和“无”字教他。白居易虽口未能言，但心已默识。“幼识之无”后来成了成语。他曾自述说：

五六岁便学为诗，九岁识声韵，十五六始知有进士，苦节读书，二十已来，昼课赋，夜读书，间又课诗，

不遑寝息矣。以至于口舌成疮，手肘成胝。既壮而肤革不丰盈，未老而齿发早衰白，鬓髯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，动以万数。盖以苦学力文所致，又自悲矣（《与元九书》）！由此可见他是何刻苦读书和努力学习写作的。

当然，勤奋学习达到损害青年人健康的地步，那也不足效法。但又要看到这一点：学业不负有心人，白居易终于成就了一代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诗人。

由于白居易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写作训练，所以参加科举考试，比较顺利。

白乐天一举及第。诗曰：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。”乐天时年二十七。省试《性习相近远赋》、《玉水记方流诗》，携之谒李凉公逢吉。公时为校书郎，于时将他送，白遽遗之。逢吉行携行看，初不以为意。及览赋头，曰：“噫！下自人上，达由君成；德以慎立，而性由习分。”逢吉大奇之。遂写二十余本。其日，十七本都出（《唐摭言》）。

慈恩寺在陕西西安，寺里有著名的雁塔。唐代中宗以后，凡考中进士的，皇帝要在曲江赐宴，并题名于雁塔。白居易是公元772年出生的，中进士在公元800年。当时录取的十七名进士，以他年纪最轻。他参加省试时的答卷，文章的确做得好。考试的赋题《性习相近远》，语出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白居易不仅善于审题，而且善于扣准标题，确定自己的文章的旨趣。“下自人上，达由君成；德以慎立，而性由习分。”四个并列的分句，既点明了标题所概括的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”的道理，又进一步引申到人的卑贱、穷达、德行、习性诸方面去，自然要使李逢吉称赞不已。封建社会读书人命运的穷达是由皇帝决定的。如果受到赏识，立刻平步青云；如果触犯龙颜，那就只好自认晦气。应当说：白居易的这个观点还是正确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的。

“长啸公”范镇

北宋时候，有一位无论是道德，还是文章都蜚声于朝廷的人，名叫范镇。他籍隶四川成都。关于他年轻时的情况，《宋史》本传上有如下的记载：

范镇字景仁，成都华阳人。薛奎守蜀，一见爱之，馆于府舍，俾与子弟讲学。镇益自谦退，每步行趋府门。愈年，人不知其为帅客也。及（薛奎）还朝，载以俱。有问奎入蜀何所得，曰：“得一伟人，当以文学名世。”宋庠兄弟见其文，自谓弗及，与为布衣交。

宋庠两兄弟也很不简单。他们是湖北人，老兄宋庠字公序，老弟宋祁字子京，二人同时考中进士，宋庠名列状头。宋祁曾同欧阳修等合作编修《新唐书》，官至工部尚书，拜翰林学士承旨，死后谥景文。宋子京又擅长填词，由于他有一首《玉楼春》，其中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一句

真把春天的气氛渲染得出神入化，因而赢得了“红杏尚书”的桂冠。此事，在后面谈遣词造句的一组文章里，还要专题加以介绍。《宋史》说，宋庠、宋祁两兄弟读到了范镇的文章，“自谓弗及”，其中包括一个与审题目相关的故事。

范蜀公少时，与宋子京同赋《长啸却边骑》。蜀公先成，破题云：“制动以静，善胜不争。”景文见之，于是不复出其所作，潜于袖中毁之。因谓蜀公曰：“公赋甚善，更当添以二‘者’字。”蜀公从其说，故谓之“制动者以静，善胜者不争”。

然，景文赋虽不逮于蜀公，他人亦不能到。破题云：“月满边塞，人登戍楼。”真奇语也（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）。赋题作《长啸却边骑》，题面的意思是仰天一声长啸，迫退了前来骚扰边界的少数民族的军队。而究其实质则强调了坚持防御，坚持和睦的原则。范镇开头两句：“制动者以静，善胜者不争”，不仅扣准题目，而且还深刻地表达了辩证法，所以能使宋子京为之佩服，范镇审题的本领是强大的。据说，正是因为少年时写过这篇有名的文章，而又远播于兄弟民族地区，连“契丹、高丽皆宣诵其文”。他晚年出使于辽，到了那里，人们相目曰：“此长啸公也。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至于宋祁，他是写抒情小品的大家。“月满边塞，人登戍楼”八字诗意极浓。可惜只就八个字还看不出主题思想来，因此无法从审题、标题的角度去作评价。

这位“长啸公”，生前同司马光、苏轼站在一条线上反对王安石变法。他与司马光曾互相约定：“生则互为传，死则作铭。”司马光为范镇写了传记，赞扬范为人勇决；范镇于司马光死后为他作了墓志铭。铭文中有这样的话：“熙宁奸朋淫纵，险谗险猾。赖神宗洞察于中。”语言激昂露骨，锋芒直接指向混进变法队伍中的奸佞。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请苏轼书写，苏轼说：“轼不辞书，惧非三家福。”最终还是改换了铭文。

锦瑟

古代有些诗人由于别有寄托而又不愿明说，往往故意以“无题”名篇，这种诗叫做无题诗。此外，也有诗人仿照《诗经》的办法，取诗的起首二字为标题，而标题又不能概括全诗的内容，这仍属于无题诗一类。

李义山是喜欢写无题诗的。他的诗集开宗明义第一首，题为《锦瑟》，人们也把它看作是无题的作品。《锦瑟》诗“史称其瑰迈奇古”，由于它的词藻华丽，情致缠绵，景象迷离，含意深邃，诗的中心思想究竟是什么，就一直存在争论。相传宋朝时候，山谷道人读了《锦瑟》也觉得不好理解，甚至找他的老师苏东坡请教。可见千多年来这件迄无定论的公案，是颇有研究价值的。现在把全诗抄在下面：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

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
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
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！

这首诗的一、二两句说：锦瑟为什么不多不少刚刚五十根琴弦呢？锦瑟上的一弦一柱，弹出的曲调，勾起了我对逝去的五十年的回忆。三、四两句和五、六两句都是“思华年”的具体内容的铺写：庄生梦为蝴蝶，望帝化作杜鹃，真是令人无限迷惘，无限悲哀。而自己的遭遇则有如明珠遗落在碧海之中，饱含着眼泪。至于“蓝田日暖，良玉生烟”的说法，目前看到的最早出处是司空图的《与极浦书》，意思是可望而不可及（见王应麟《四库纪闻》）。可见也无非指的是美好理想终成幻影。结尾两句说：五十年过去的情景，岂是如今追忆才感慨系之，其实，就在当时已不胜怅惘了！

总的看来，《锦瑟》不可能不是一首“自道生平之诗也”（汪辟疆《玉茗诗薈举例》）。

但许多人却刻意求深，力图发掘这首诗的所谓“隐秘”。有的认为，“义山婚王氏，时年廿五，意其妇年正同，夫妇各廿五，适合古瑟弦之数”；“或云锦瑟，令狐楚之妾。”（参看刘开扬《唐诗论文集·论李商隐的爱情诗》）有的认为，“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。”（刘攽《中山诗话》）他们断言《锦瑟》是悼念一个女人的作品。

但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索隐式的解释。有一种说法是“义山自题其诗以开集首者，次联言作诗旨趣，中联又自明其匠巧也。”不过，问题在于李义山的集子并不是他自己编定的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：“余颇疑此诗是伤唐氏之残破，与恋爱无关”（岑仲勉《隋唐史》）。现在看来，说这首诗不专写恋爱是恰当的；说它完全与恋爱无关则是不恰当的。因为诗人“五十年”生活的回忆，绝不排斥其中包含有恋爱的内容。

倒是苏轼对《锦瑟》一诗的解释，既照顾了全诗中间两联四句与“锦瑟”的关系，又能概括五十年追忆的饱和着复杂的思想感情。他的说法后人是这样转述的：

李义山《锦瑟》……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。后以问东坡，东坡云：“此出古今乐志，云锦瑟之为器也，其弦五十，其柱如之，其声也适、怨、清、和。”案：李诗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适也；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怨也；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清也；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和也。一篇之中曲尽其意。史称其瑰迈奇古，信然（参看《诗人玉屑》）。如果读者同意这种解释，便可看到：《锦瑟》不是一首“篇名不能概括全诗内容”的无题诗。恰恰相反，《锦瑟》倒是一首紧紧扣住标题的咏物诗。标题与内容完全吻合，天衣无缝，浑然一体。不过，应当对苏轼的解释作一点补充：咏物的目的，或者说咏物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，则在于“自道生平”，回忆五十年“惘然”的遭遇。辛弃疾有“五十弦翻塞外声”之句，在李义山那里却是五十弦翻作惘声了。

不过作为表现一般的“适、怨、清、和”情致的四句诗，对于李义山来说又有它特定的含义。所谓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，在“适”中又包含了“迷惘”的成分，这是“当时已惘然”所规定的了；所谓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，在“和”中又包括了“可望而不可及”的短暂的希望的最终的破灭，这同样是“当时已惘然”所规定的了。

当然，另一方面我们在充分肯定李义山善于标题、审题，善于扣紧题目做文章的同时，也要看到：《锦瑟》中间两联四句似还存在“獭祭”的痕迹。唐宋人作诗每有先得佳句而后拼凑成篇的，这自然也就增加了索解的困难。

前人甚至有的胡乱猜测，就是《锦瑟》两联四句，“述旧所历诸名区”（李光緒《锦瑟诗解》），那就等于写游记了。但我们要反问一句：既然是游历的名区，当属“赏心乐事”，怎么反而“当时已惘然”呢？

最后，再申明一下：《锦瑟》这首诗正是由于存在“獭祭”（参看《玉谿生诗案笺注》及《唐音癸签》）的痕迹，所以不好理解，我们不必为李义山辩护。金代元好问说得完全正确：

望帝春心托杜鹃，佳人锦瑟怨华年。

诗家总爱西昆好，独恨无人作郑笺。

简讯二则

政教系师生结合教学积极开展科研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政教系师生把学习、宣传、研究和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。他们根据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布的重要文献，结合专业与教学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，阐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丰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，在提高教学质量，活跃学术空气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，都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近三年来，全系师生在中央和省、市报刊上共发表理论文章一百多篇。部分教师编写或参与编写的《马列主义基础知识问题解答》、《哲学问题解答》、《政治经济学说史纲要》、《科学社会主义》、《浅谈社会主义

经济效果》、《中共党史人物介绍》（第一集）、《学习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〉参考资料》等书，已分别由四川、陕西、青海等省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，向全国发行。去年，这个系还举行了学《决议》演讲比赛和小论文比赛。全系学生共写出阐述《决议》中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九十五篇。七七级一班学生张延安获得成都市大学生演讲比赛的第一名，他的演讲录音《单凭生活水平的高低能够判定社会主义制度优劣吗？》、已由省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听众播放。

（邓奎金）

教育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

教育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是师范院校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。我院教育学、心理学教研室的教师在讲授人民教师的地位、作用和任务时，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，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，或安排学生听模范班主任的报告、到中学见习，或布置书面作业引导学生回答“做一名人民教师的新认识”等方法，满腔热情地帮助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。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，打动了学生的心灵，使绝大多数学生认识了教师的无尚

光荣，坚定了专业思想。同时，针对部分学生只重专业学习，不重视教育学科的偏向，教育学、心理学教研室的教师又用中学模范教师的事迹，反复讲明按照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去教育青少年的重要意义，使学生认识到只有学好和掌握教育规律，提高从事教育工作的能力，才能为将来作个优秀的人民教师作好充分的准备。

（永政）